



美国对外战略的设计者  
石斌 周桂银 戴超武 主编



赶快去做必须做的事情，  
尽你所能迅速和有效地去做，  
如果你停下来分析你正在做的，  
那么你无非是在削弱和搞乱你的意志，  
结果将一无所成。

吕磊 著

# 艾奇逊

美利坚「帝国大厦」的  
初代建筑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ean Gooderham Acheson*

吕磊 著

# 艾奇逊

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吕磊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

(美国对外战略的设计者)

ISBN 978-7-301-28910-5

I. ①艾… II. ①吕… III. ①艾奇逊(Acheson, Dean Gooderham 1893-1971)—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9553号

- 书 名** 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  
AIQIXUN: MEILIJIAN “DIGUO DASHA” DE CHUDAI  
JIANZHUSHI
- 著作责任者** 吕磊 著
- 责任编辑** 武岳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910-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微信公众号** ss\_book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社科-北大图书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90毫米×1240毫米 A5 9.875印张 229千字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主编的话

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创造的。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据此，历史乃无数人物之“传记”。史缘于事，事缘于人；无人则无事，无事则无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原本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伟大的太史公即是楷模。如果只议事、不论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隐匿了，历史的星空势必黯然失色。历史记录本来就是人类自身的写照，人们怎能容忍“无人的历史”呢？

站在 21 世纪举目回望，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20 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当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地位非常突出，不仅成为绝无仅有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美国意识形态或“生活方式”更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而美国这种独特地位，尽管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在 20 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重要的守成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重要的新兴大国。研究美国的强盛之道，包括“人的因素”，尤其是美国外交与战略精英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意义不言而喻。

这就是我们决定编写这套丛书并以冷战时期为研究重点的一个主要原因。

美国外交领域值得研究的人物当然还有许多,我们的选择有主客观两方面的考虑:或因为相关档案材料较为丰富,或因为此人在某些方面的代表性,或主要因为作者的研究兴趣与专长,等等。但毫无疑问,这十位政治家都曾在20世纪美国外交的某个阶段、某个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得起“美国对外战略的设计者”这个称号。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有时涉及同样的人和事,不同的作者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很自然的。达成共识诚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学术研究并不以意见统一为出发点,恰恰相反,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才有可能“殊途同归”。所以我们对于丛书的撰写只规定了几条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想要达成的目标:

其一,尽可能利用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注意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我们鼓励借鉴国际政治理论、决策理论、战略史与战略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并且在展示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过程、决策机制和实施过程的同时,注意揭示有关决策者的政治哲学、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及其所反映的美国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传统。

其二,丛书虽然具有政治评传的性质,但并非面面俱到的人物传记,而是着重揭示有关人物在战略与外交领域的主要思想和实际影响。鉴于人们过去较多关注总统等“前台”人物,对于政策背后那些思想型人物却注意不够,我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聚焦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有思想、有政策影响的谋士型、智囊型人物。这不仅有助于丰富美国外交的研究视角,还有

助于使我们的认识从物质、技术的层面上升到思想的层面和战略的高度。

其三,在保证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前提下,兼顾趣味性与可读性。但我们并不打算靠搜罗各种逸闻趣事或花边新闻来“吸引眼球”,更无意通过渲染这些社会名流、政坛精英的个人奋斗史来提供类乎“励志文学”的教化功能。我们的关注点,乃是美国人的精神气质、思想遗产、政治智慧、历史经验或成败得失对于我们可能具有的启发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将着重思考和展示一个迄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即战后美国世界性主导地位或全球“霸权”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以及战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战略精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评估自身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

由于资料条件、研究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离上述目标可能还有相当距离,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写作初衷,读者诸君倘能有所会心,从而引发新的思考,那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2013年12月8日于南京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学徒”时代 / 5

第二章 成为冷战战士 / 39

第三章 吹响号角 / 88

第四章 遏制战略的转型 / 148

第五章 朝鲜战争 / 238

结 语 / 305

## 序 言

这是一本有关“帝国”精英的书。

十几年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S. Maier)曾经给帝国下过一个定义。他说,帝国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支配国——‘母国’或‘中心’——的社会集团在国外的某些地区创造了一个与之结盟的精英网络,(域外的)那些精英以接受国际事务中的服从地位去换取他们在自己管理单位(‘殖民地’或空间意义上的‘边缘’)中的地位安全”<sup>①</sup>。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以来,讨论帝国或将美国视作帝国的著作数不胜数,但很少有哪本书对帝国的界定能达到梅尔的水平。

不过,我们这里的“帝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析性概念,而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表达,它是指所有那些曾经在自己的域外建立起较持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存在的国家。古代的罗马,传统中国,现代时期的西班牙、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

---

<sup>①</sup> Charles Maier, *Among Empires: 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



大战到今天的美国都属于这样的“帝国”。

所有的“帝国”都需要朋友，梅尔帝国概念中边缘地区的精英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友。朋友不是单靠拿钱就能买来的，朋友也不是威逼就能跟你走的。朋友需要经营，如何拉朋友、让朋友尤其是重要的朋友愿意跟自己站在一边是“帝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冷战时期，苏联的朋友很多，但关系多不牢靠，要么心不甘情不愿，要么纯粹是负担，要么好的时候蜜里调油，坏的时候刀兵相向。冷战时期的美国就比苏联会交朋友，尤其是凝聚力极强的西方联盟堪称典范。美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很多理论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有五花八门的论说，但似乎都忘了那些为美国去经营盟友关系的个人。遏制思想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8年曾为跟西欧国家打交道头疼不已，感慨地说：“对付敌人很简单，比对付朋友简单。”<sup>①</sup>本书的主人公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付朋友就很有两手，他的冷战战略说白了就是拉朋友和维护朋友关系的战略。

那些能长时间维持“帝国”的国度都必然有某种信念或使命感，“帝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界定国家的角色、对外政策并为之辩护。16世纪到19世纪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曾自视为全世界的领主，这种自我定位就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帝国”意识形态。二战后的美国同样有其“帝国”意识形态——“美利坚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American nationalist globalism）。这一信念结合了美国传统自我界定中的“上帝选民”和使命感，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新观念——整个世界现在都是美国对外政策关切的范围；美国将以传统美国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自由企业等

---

<sup>①</sup>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被美国人深信为普世性的价值——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其当时拥有的强大力量。“帝国”意识形态是精英的,即精英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提出者、传播者和阐释者,但也必须是大众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提升国家信心,使人具有目的性。而“没有广泛一致的看法,国家就无法动员资源……来实现一致的目标,以及要求公民承受牺牲和潜在的挫折来实现那些意愿”<sup>①</sup>。

所有的“帝国”都有其精英,他们是“帝国”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掌控者,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帝国”的毁灭者。18—20世纪初的俄国贵族就是“帝国”精英,正是他们和专制君主的联盟将俄国从一个虚弱、不受尊重的国家提升到欧洲大陆的显赫地位。结果,他们的自我身份和俄国的大国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1906—1910年间担任外交大臣的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所说的那样,“降为二流国家……将是俄罗斯的重大灾难”<sup>②</sup>。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外交官也是最典型的“帝国”精英,这个群体拥有少见的高度同质性。他们的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完全相同,大多出身于上层阶级,在最好的公学和牛津、剑桥接受教育,世界观完全一致,以至于人们以“外交部精神”(Foreign Office Mind)名之。<sup>③</sup>二战后的美利坚“帝国”同样有其精英,艾奇逊就是美国

---

<sup>①</sup> 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Cold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7; 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本书对美国承担世界角色的基本认识属于韩德所谓“含混的主流观念”,孰是孰非,读者诸君自行判断。韩德对“主流观念”的批评,见上书“中文版序言”。

<sup>②</sup> D. C. B.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6.

<sup>③</sup> 参见 T. G. Otte, *The Foreign Office Mi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65-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的“帝国”精英。

从不同的角度看,美利坚“帝国”有不同的奠基时刻。从对外关系方面来看,人们公认二战结束后和冷战初期的那段岁月特别重要。正是在美利坚“帝国”的这段诞生期,艾奇逊在国务院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位,1941—1945年间先后担任负责经济事务和负责国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7年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间任国务卿。他参与构想和建立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他在冷战初期美国采取的许多重大举措和行动中——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的建立、将两个前敌国西德和日本改变为美国的盟友、干预朝鲜战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有些问题上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他在1969年出版回忆录时,将之名为《亲历创世》(*Present at the Creation*),有些自大,却也不无道理。

本书主要考察的是作为战略家的艾奇逊。应当承认,艾奇逊主要是一个行动家,不是一个在战略方面有原创思想的国务家,和凯南算是战略家中的两个极端。艾奇逊的老友、1948—1952年间担任英国驻美大使的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在接受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访谈时说,艾奇逊主要是“一个行动派。他想把事情做起来。我相信他感到凯南和他不同:凯南总是待在他的小屋子里,酝酿一些重大观念,但并不特别关心将这些观念用于眼前面临的事情”。凯南放眼长远,艾奇逊则想知道,“我现在做什么?”<sup>①</sup>艾奇逊的冷战战略尤其是到1949—1950年间他提出的创造“实力优势情境”(situation of strength)战略,简单甚至有点粗暴,却有效。

---

<sup>①</sup>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Penguin, 2011), p. 339.

## 第一章 “学徒”时代

美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首强是近七十年来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界定性特征,也是学术界和许多一般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毫无疑问,诸多的结构性因素促成了美国长时间的世界首强地位,也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建立其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不过,作为历史行为者的个人在这一秩序出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著名冷战史学家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艾奇逊小传中,就此有颇为到位的评论。他写道:“做出政策选择的不是结构,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缺点、局限和弱点。正是这些美国决策者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建立一个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在他们看来反映了他们国家的基本需要、利益和价值观。他们塑造了这一体系的轮廓;确定其特质;利用必要的资源去维持体系;奋力以求国内外观众接受体系的合法性;寻找秩序最可能的障碍和威胁;设计出具体的战略消除障碍、对抗威胁。”<sup>①</sup>

---

<sup>①</sup> Robert J. McMahon, *Dean Acheson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Potomac, 2009), pp. 1-2.

在解释 20 世纪前半期美国为何未成为超级大国这一重大问题时,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家雷诺兹(David Reynolds)使用了四个基本概念:“环境”“意图”“利益”和“机构”。其中“环境”意指国际关系总的模式,它为国家扩展其权力和影响提供了机遇和限制。“意图”则是指利用国家的资源影响国际事件的决心,或者说大国抱负或过去德国人常说的“权力意志”。这种“意图”或“权力意志”往往根植于特定国家的道德信念、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当中,但它要完全发挥作用通常需要一种国家“利益”观念,即国家的繁荣和安全有赖于塑造世界事务的特定认识。一个国家要扩展其权力和影响,影响国际事件,塑造世界事务,只有在该国拥有合适的“机构”利用并向外投射国家的力量时才是可能的,这些机构包括外交团队、武装力量以及得到有效协调的政府官僚机器。<sup>①</sup>

依雷诺兹之见,尽管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早在一战之前已然跃居世界第一,在一战当中更以其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与财政资源决定性地支撑了协约国的战争努力,但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西半球的地区性强国。<sup>②</sup> 一战之后,由于英法的迅速恢复,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只是临时性的。而无论是美国拒绝加入国联,还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欧亚两地法西斯扩张势力抬头之后国会和许多公众依旧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来看,美国尚

<sup>①</sup> David 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4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2.

<sup>②</sup> David Reynolds, “Rethinking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1 (Winter, 1988-1989), pp. 89-111; B.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 pp. 339-342.

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权力意志,不愿意在更广大的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不愿意在西半球以外地区承担广泛的义务,至少多数美国人是如此。就“机构”来说,一战刚一结束,威尔逊总统和国会就迅速地采取了复原措施,除了海军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之外,陆军从停火时的240万人下降到20年代中期的13万人左右。罗斯福实施新政后,大幅度增加的行政当局人员主要是为了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外交。更为根本的是,美国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讲对利益的主流认识并不要求大规模的对外干预,不管在经济还是在安全上,世界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世界的需要。在经济上,美国的国内市场过于巨大,使得它相对来说远不像19世纪下半期的英国那样依靠整个世界的市场和原材料,因此有着强烈的动机去促进世界贸易和投资,特别在萧条时期。在安全上,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历史学家伍德沃德所说的“免费安全的时代”<sup>①</sup>,两大洋天然的屏障和不存在强邻使得得天独厚的他们无须像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那样担心受到外来侵略。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比尔德(Charles Beard)正是以此为据告诫他的同胞不要重蹈一战的覆辙,介入欧洲战争;美国对世界的职责仅仅是充当典范而非国际宪兵或世界警察。<sup>②</sup>

二战改变了上述状况。在战争当中欧洲传统列强遭到了远比一战更为严重的打击,法国被占领且在战后长时间内失去了大国地位,英国丧失了1/4的财富,从世界上第二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并开始酝酿收缩与调整其海外义务。英法权力的急剧衰减再加上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留下了可供美国去填补的权力

<sup>①</sup> C. Vann Woodward, “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1 (October 1960), p. 3.

<sup>②</sup> 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 *America'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14.

真空,即使在这方面美国并非战争唯一的受益者。更为重要的是,与一战后相比,1945年的美国已经具备了权力意志。战争引发了美国对外政策基本认识的意义深远且持久的变革,即从所谓的“孤立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借用亲身经历这一转变的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话说,珍珠港意味着孤立主义的终结。<sup>①</sup>

当然,转变的过程并不像范登堡所说的那样简单和彻底,而是经过了异常激烈的大辩论,更何况孤立主义情绪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反军国思想”(anti-militarism)在战后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和面貌存在。不过总的来说,日本突袭珍珠港、包括空中力量在内的远程攻击技术的发展以及原子弹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一般民众和精英认识到,美国享有“免费安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正在形成中。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新国家安全观念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干涉与承担广泛的国际义务提供决定性的合法性证明,许多精英和关心对外政策的公众认可美国承担国际义务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从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观念的新正统。概要地讲,新正统包括三个基本要素。<sup>②</sup>

第一,也是最核心的要素,西欧对于美国未来安全的重要性。李普曼在1943年4月出版的一部销量极广的著作《美国对外政策:共和国之盾》中,以雄辩的笔触向他的国人推销这一认识。这位在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极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栏作

<sup>①</sup> 以上两段文字除另有注明外,主要参考 David 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pp. 293-300。

<sup>②</sup> *Ibid.*, pp. 300-304; 对比 Douglas T. Stuart,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 1; Michael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1。

家在书中强调,希特勒 1940 年的胜利已经表明,美国绝对不能允许潜在敌人控制西欧的工业资源。如果说在过去,大西洋、皇家海军和欧洲均势可以保证美国不受侵犯的话,那么空中力量的发展和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虚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对于国家安全的传统理解。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是“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并为此支付会费。<sup>①</sup>

第二,全球性的安全新观念。如果日本可以越过 5600 公里攻击美国舰队,美国的防御线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北美大陆、西半球或两大洋,而是在遥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对于美国来说,安全不再仅仅是半球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从 1942 年开始,以斯拜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为首的一批地缘政治学家以不同的形式重申麦金德的核心观点,美国不仅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还要保证东半球免受单一的对大国的控制。政府内部的决策者们得出了同样的看法。早在 1941 年 1 月,罗斯福总统告诉美国驻日大使,“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巨大,问题相互之间的关联是如紧密,以致即使谈论这些问题都必须从五大陆、七大洋的角度说起”。显然,早在珍珠港之前,罗斯福已经预见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给美国对外关系以及相应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参战之后尤其到战争临近结束政府内部考虑战后秩序问题时,决策层已经可以更加明确地从全球范围内界定美国的安全和利益。罗斯福总统及其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曾在 1944 年和 1945 年两次向丘吉尔与斯大林重申,“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而非仅仅局限于南北美洲和太平洋”。1943—1944 年,军方计划人员在认真考虑美国战后安全时,更是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精心设计了一整

<sup>①</sup>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Little, Brown and Co., 1943).



套海外基地体系,将之作为美国的战略边界。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说得更是明白:“过去我们满足于西半球防御作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sup>①</sup>

第三,和平依赖于繁荣的信念。当然,这一信念并不新颖。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第三点就涉及削减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后,赫尔(Cordell Hull)领导下的国务院在那个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一直致力于实现威尔逊的理想。但国会对此并不热心。直到战争爆发之后,威尔逊的这一思想才成为官方的正统。到1942年,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都特别强调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重建以可兑换的货币、稳定利率和非歧视性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对于美国最为有利,作为实际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从开放的市场中获益最大。尽管战前的出口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10%,但某些关键行业特别依赖于外部市场。不过,贸易的增长无疑有利于所有国家,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二战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和商业竞争。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Will Clayton)在1945年5月说,“在市场上为敌的国家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是长期的朋友”。经济增长会缓解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冲突,从而减少激进变革的压力。许多美国决策者希望,这种“生产力的政治”能取代革命

---

<sup>①</sup> 入江昭:《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卷3,张振江、施茵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55页;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38;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6页;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8”,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89/2 (April 1984), pp. 349-350.